

博物館與文化 第 6 期 頁 117~139 (2013 年 12 月)

Journal of Museum & Culture 6 : 117~139 (December, 2013)

博物館與當代中國文化治理

古明君¹

Museum and Cultur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ing-chun Ku

關鍵詞：文化治理、博物館實作、當代中國

Keywords: Cultural governance, Museum practices, Contemporary China

¹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Email: mcku@mx.nthu.edu.tw

(投稿日期：2013 年 10 月 14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3 年 12 月 9 日)

摘要

本文採用 Tony Bennett 的「文化治理」之分析概念，在文化與治理之間變動關係的歷史脈絡下，討論當代中國博物館的歷史發展與變化。本文指出：相較於 Bennett 筆下在自由民主政治理性之中誕生的西歐博物館，中國的博物館的誕生與發展，糾纏在社會主義國家肇造的過程。毛時期的中國，黨／國家意識型態壓抑了博物館專業主義，博物館視為愛國主義教育的治理技術，在馬列毛思想指導下的博物館工作，負有文化宣傳的任務。其文化治理的目標，是形塑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與人民的心智與情感。而在改革開放時期，專業主義浮現於博物館實作中，使得博物館展示陳列、與解說導覽，都呈現與毛時期不同的樣貌。此外，在中國的旅遊經濟發展中，博物館成為旅遊吸引物，預期的造訪對象是「訪客」而非「群眾」或「人民」。雖然如此，在特定的時刻或特定的地點，黨／國家仍試圖操作博物館實作，以確認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正當性。以此，本文歷史性地討論了這些不同的價值架構在博物館此一論述空間中的起伏消長，並分析作為文化治理技術的博物館實作涉及的政治理性。

Abstract

Using Tony Bennett's analytical concept of "cultural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useum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anging relations of culture and government. It argues that, different from its counterparts in Western Europe emerging in the political reasons of liberal democracy regimes,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museums in contemporary China was intertwined with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s China, Marxism-Leninism-Mao-Zedong-Thought and nationalism dominated museum practices, which were officially considered as government technology of patriotic pedagogy to shape the mind and emotion of "the mass" and "the people." In the Reforms era, professionalism emerges in the museum

practices so that the modes of exhibition, display, and narrations of the docents significantly differ from what they were in the museums under the reign of Mao. In addition, museums have becom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China so that museums now are open to “general visitors.” Yet, the state and the Party in China still tend to use museums as a technique to legitimize its rule in specific cases or occasion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dynamics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state ideologies in museum practi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 the dissonance between different modes of cultural governance.

前言

中國近年來的博物館收費問題（詹挽強、王俞波，2008）、博物館陳列與展示美學的轉變（Varutti, 2011）、或者大眾旅遊造訪對博物館日常管理的影響（古明君，2012）、以及私營博物館的出現等現象引發了學者的研究興趣。本文不由個別的議題與現象入手，而討論博物館在當代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來彰顯這些議題與現象背後的意涵：博物館實作在今日中國面臨的諸多轉變。

本文採取了社會主義文化治理作為分析的架構，來討論博物館在當代中國的誕生與變化。社會主義文化治理，在此指的是文化、與社會主義治理二者在特定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制度化關係。本文認為這樣的制度化關係形塑了博物館作為社會主義中國文化機構的特性。本文面對目前中國博物館變革與轉型的種種現象，從文化治理的視角切入，試圖回答下述的研究問題：在今日，為何新的論述、價值、目標，出現在中國的博物館實作中？社會主義中國由建國以來到改革開放時期，作為一種治理技術的博物館，如何想像治理的對象、目標、或者以何手段引領治理的對象朝向特定的目標？而這些手段與目標，和博物館學典範、博物館實作如何發生關係？

文獻：作為一種治理技術的博物館

本文由文化治理為分析架構，主要是受到 Tony Bennett 相關研究的啟發，並且參照 Bennett (1995, 2004)筆下的歐洲與澳洲的公共博物館，以理解當代中國博物館的形構與轉變。Bennett 以文化治理來概念化文化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則是受到傅柯「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概念的影響（吳彥明，2011；Bennett, 1992a, 1992b, 1998, 2000, 2003）。傅柯演講與筆下的治理性，涉及自 16 世紀起現代國家形成的歷史過程中，逐漸浮現的一種權力施展的技術，至 17-18 世紀形成了一種新的權力形式(Foucault, 1991, 2007; 吳彥

明, 2011; Dean, 1999): 以國家的形式、或是在國家制度下被理性化且集中化的權力(Foucault, 1982)。國家雖然涉及領土主權, 但現代國家從歷史地表中浮出, 更涉及了依循特定理性而運作的「治理的藝術」(art of government) 逐漸出現(Foucault, 2007)。與領土主權形式的權力不同, 治理的藝術注重的是人與事物的佈署。「它的運作成功與否牽涉一系列的制度、程序、分析、反省、計算、計謀, 目標在於人口, 是一種政治經濟學的知識以及保安的機制」(Foucault, 2007: 108), 且此種權力形式的效果同時呈現在整體化與個體化(Foucault, 1988a, 1993; Gordon, 1991), 得以形成個體被他者的宰制、與個體自我引導之間的交會(Foucault, 1988b)。

延伸傅柯的治理性概念, Bennett 指出: 文化是社會規約管理相關的、一個獨特的治理領域。文化既是治理的對象、亦是治理的工具。社會中特定社會階層的道德、禮儀與生活方式, 也就是特定人群的文化生活, 被視為是治理的對象。而透過藝術或智性活動等文化活動為手段得以管理與干預人群的道德、禮儀等, 使得文化具有治理上的工具性意涵(Bennett, 1992)。現代社會的治理, 伴隨著各種新技術的浮現, 這些技術「目標是調節個體與人群的行為。...這些技術以它們自己特有理性: 他們構成了有利於權力施展的特定方式。」(Bennett, 1995: 89-90)而當我們將文化視為治理的對象與治理的工具時, 博物館可以視為文化治理的技術之一。在其對於歐洲與澳洲的公共博物館的形構與轉型的研究中, Bennett 指出, 自 19 世紀以來西歐現代公共博物館的誕生, 交纏著自由民主政體的政治理性²:

「公共博物館是作為共享先前私有的物品, 曝光那些被隱藏事務的一種手段而建構起來的。...」以法國大革命為例: 「以人民的名義沒收了王室的、貴族的、教會的收藏品, 廢除了那些與皇室、封建

² 此處使用「政治理性」一詞, 是沿用 Tony Bennett 的架構, 討論博物館此種治理技術涉及之政治理性。簡要來說: 博物館作為文化治理技術, 使得權力得以以某種方式施展。政治理性, 則涉及權力施展時, 欲達到之目標與使用之手段之間如何安排具有合理性。原文請參閱 Bennett (1995: 89-105)。

聯盟的...根據理性主義的分類原則，安排遺留物的展覽，從而把博物館從專制力的象徵、轉變成一種教育公民而服務於國家的集體利益工具。」(Bennett, 1995: 89)

在西歐自由民主政體下誕生的公共博物館，既是藝術菁華的殿堂、又是民主教育的工具。透過展示中的物的秩序，博物館再現了國家所有成員之文化，而向公眾開放參觀、更使得博物館有了規約訪客行為、引導其行為舉止的治理目標(Bennett, 1995: 95-101)。因此，公共博物館既是國家權力的展示機器(exhibition apparatus)，又能將失序的民眾、轉化為自我規約的「市民」，並且生產出合宜的主體：進步且柔順的市民(Bennett, 1995: 62-63；郭瑞坤，2010)。因而，博物館不只是文化機構，更是國家的統治技術³。透過博物館，特定的治理心態(mentality)得以將對於社會的治理，作用在人們的自我治理中。

Bennett 認為，作為治理的技術的西方公共博物館，誕生於西歐現代性與民主政治治理性。這使得它必須兼具兩種原則：第一是公眾權利的原則，第二是充分再現的原則(Bennett, 1995: 90)，而這兩種原則直到今日仍帶來公共博物館持續面對的改革與挑戰。相較之下，博物館誕生於中國歷史脈絡非常不同，因此，在西方脈絡下的公共博物館，到了中國，就必須對這個公共加上引號。首先，在中國，作為治理技術的博物館，其所設定的目標人口，並非民主政體下具有文化公民權之公民；其次，博物館的再現原則，並非民主政體下「不同公眾的文化與價值的需求」(Bennett, 1995: 90)。這是由於當代中國的博物館的誕生與制度化，與社會主義國家肇造過程的文化政治交織在

³ 審查意見指出：在本文中，我對於 Bennett 的博物館相關著作的理解，側重其作為治理技術，而未觸及博物館等文化機構可能具有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與自我反思(reflexivity)的可能性，也未處理 Bennett 分析博物館時較不同於「治理」以外的面向。在本文中，我主要沿著 Foucault-Bennett 「文化治理」的概念架構來分析中國的博物館。Bennett 早期的作品，較清楚呈現以 Foucault 的理論來分析博物館，是本研究主要的參考文獻。然而 Bennett 在其較晚期的作品中，則開始稱其研究為 post-Foucaultian，淡化了治理性的理論(Bennett, 2002, 2005, 2007a, 2007b)。關於 Bennett 早期與晚期作品之差異，不在本文之分析範疇與架構中，有興趣者可參考吳彥明(2011)的文章。

一起，而社會主義威權政體的文化治理滲透到博物館的制度與實作上。

交織在國家肇造中的當代中國博物館

中國的現代博物館，誕生的時間點，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帝制中國與西方強權交鋒中。較早有法國傳教士於 1868 年在上海創辦的徐家匯博物院、1922 年在天津建立了黃河白河博物館（後名為北疆博物院），英國傳教士於 1874 年在上海創辦亞洲文匯博物館，1887 年在山東青州建立了博古堂（1904 年移至濟南為廣智院）、1904 年在天津辦的華北博物院，美國傳教士於 1876 年在山東煙台建立博物館（蘇東海，2005；Lu, 2014: 19-61）。然在，中國近年關於博物館歷史的論述中，把中國博物館發展的起點，定在 1905 年的南通博物苑誕生，主要是由於南通博物苑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博物館。在 19 世紀末帝制中國試圖現代化的過程中，洋務與維新運動人士提出創辦博物苑「古今中外、兵農工商各種新器...博覽兼收，以為益智集思之助」⁴、「大陳各種儀器...以助試驗」⁵。而南通博物苑創辦人張謇，視教育與實業為現代化之本，在 1903 年赴日本考察時參觀了大阪博覽會與東京帝國博覽館等，返國後上書奏請設立博物苑未果，其後以個人力量創立南通博物苑。他先是創立了通州師範學校，其後將博物苑設址於師範學校之西。創立初期博物苑隸屬於通州師範學校，經費由學校劃撥（梁吉生，2005）。南通博物苑的藏品分類為三大類：天然、歷史、美術。不僅通州師範學校學生參觀博物館、學習製作標本與模型、以作為學習的教材。此外，也開放社會大眾參觀，因此，南通地區學校「凡講關於動、植、礦物，常由教師率往參觀，因之人多稱為南通各校專設之標本室也」（凌振榮，2005），由於對外開放，南通博物苑也制定了「博物苑觀覽簡章」，制止「攀折花木、搖動臺石、...」（南通博物苑編，1985：37-38）等各種不宜的行止。

⁴ 上海強學會之主張（趙明遠，2005）。

⁵ 梁啟超之主張（趙明遠，2005）。

南通博物館的設立與實作，呈現了 20 世紀初的中國社會精英推動的現代化(Lu, 2014: 78-86)。在這樣的嘗試中，博物館被設想為現代教育的文化設施、打造現代國民應有的文化素質的強國的工具。值得指出的是：南通博物苑的設立完全來自私人的資金、是社會精英動員其家族與地方社會資源完成，而博物館的規劃、收藏、展示、參觀等實作的制度安排，亦是社會精英考察國外後自行設計而成。在設立的過程中，國家是缺席的。然而南通博物苑的成立，顯然具有示範的效果，社會精英持續提出由國家設立博物館的構想，也在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的建立與對外開放中實現。

在 1920 年代末期，由於經費困難、以及張謇去逝，南通博物苑經營困難，至對日戰爭結束後，南通博物苑僅剩下殘破建築（凌振榮，2005）。1949 年中國共產黨解放南通之後，雖正式提案恢復南通博物苑，但主要的工作是修繕館舍與園林。由於南通博物苑具有的象徵地位受到國家文物部門領導人認肯，1957 年在原址上重新設立了南通博物館。但重建之後的南通博物館，就如同中共在全國各地接收或新設立的博物館，在實作上並非重返 1900 年代至 1920 年代的南通博物苑所代表的範式，而是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以下簡稱馬列毛主義）指導下發展的文物與博物館工作（簡稱文博工作）。因此，1957 年重新設立的南通博物館，是一個國家所有制下的地誌型博物館⁶「蒐集、整理、陳列南通市的歷史、建設和自然資源的資料，向人民群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南通博物苑編，1985：100）不同於 20 世紀初南通博物苑所立基的現代化以及國民文化素質培育原則，社會中國的博物館建置，另有不同的政治理性，源自於中國共產黨在全面取得政權之前，在解放區與蘇區作的文化宣傳工作。根據 Elizabeth Perry (2012)對於中共革命聖地—安源—的研究：文化宣傳是中共重要的革命工具。在全面建政之前，毛澤東即提出需策略性的使用通俗文化象徵（宗教民俗、儀式、服飾、

⁶ 社會主義中國的博物館類型之一。此類型出現於 1950 年代起，中國承襲了蘇聯博物館建設的範式，在各地建立起「地誌型博物館」，其收藏與展示反映了該地方的自然資源、歷史人文、和社會主義建設等。

戲曲...)、透過民眾熟悉的文化形式進行宣傳與動員，是在這樣的文化宣傳策略下，創造出了安源所代表的革命傳統。Perry 稱這樣的文化使用策略為「文化置換」(cultural positioning)。根據史料，從 1937 年到 1949 年，在中共的解放區曾辦過數百次的各種類型的展覽會，以進行中共無產階級革命的宣傳工作(葛云莉、趙翀，2005)。Perry 也指出：雖然自建政之前就已經存在文化宣傳，但在 1950 年代之後，文化宣傳成為國家工作，是透過從黨、國家官僚部門、地方文化權威等從上而下的組織化動員，並且深掘(mining)前一階段創造出來的革命傳統，動員這些文化幅源來支援政權。不同於前一階段由民間汲取的「文化置換」，Perry 稱建國之後的文化宣傳為「文化操控」(cultural patronage)。

「文化操控」涉及的，是文化資源(符號、文化形式、與相關人員)，受到官僚化與組織化的運作，為黨與國家所用，以進行文化宣傳。從這個分析出發，有助於我們理解博物館涉及中共的文化治理。中共在取得政權的過程中，在各地接收既有的圖書館、博物館等文化機構，對於這個剛建立的國家來說，雖然接收保管前一政權遺下的文化機構與藏品，象徵了政權轉移，但這些被接收的文化機構應該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在當時其實並不明確。建國之後，博物館在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功能與定位，成了新的問題，舊的範式(南通博物苑)完全無法適用，因為此時這個問題涉及了不同的政治理性。中共是向蘇聯學習，來解決社會主義中的博物館問題。1917 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要如何對待前一政治體制下形成的博物館？博物館這樣的「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下的產物」，是否要繼續存在於無產階級革命之後的蘇聯？在俄共政治菁英與前衛文化運動者之間，對這些問題的回應方式，存在著爭議。雖然前衛文化運動者提出了消除博物館的論述，但蘇聯共產黨卻保存了博物館以保存前政權的遺留的大量的藝術收藏(Badica, 2011)，並且開始「改造舊博物館，建立新博物館，使博物館成為『國家教育機關』」。(劉建美，2007) 在 1960 年代末中蘇關係交惡之前，無論是關於社會主義中國要如何建設博物館，或者是關於博物館在社會主義中國的文化治理上的定位，在理論上或是實作層面上，中國基本上是向蘇聯取經。不僅中國，當時東歐與中

歐共產主義國家，在文化政治與文化機構建置的模式上，都受到蘇聯影響。共產主義國家的博物館學，在系譜上都是聯繫至蘇聯於1955年出版的《蘇聯博物館學基礎》一書(Badica, 2011)。這本書出版後兩年就由中國國家文物局下負責文物博物館（簡稱文博工作）的小組譯成中文並出版，成為1950年代官方定調下博物館理論與實務之依據。此書以馬克思主義來闡明蘇聯博物館學理論、與博物館實作的特性。內容包括定義蘇聯博物館、博物館工作的特殊性、博物館徵集典藏工作、藏品登記與鑑定、保管和陳列，以及博物館群眾工作的形式和方法等。除此書外，中共文博工作還翻譯了蘇聯博物館學相關的著作。根據中國文化部文物局主編的《中國博物館學概論》一書，在1950年代，中國編譯介紹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博物館學和博物館工作的文章、著作，達120餘種（中國文化部文物局，1985：20）。此外，若從博物館建制方向以及組織架構來看，也可以看到蘇聯模式的影響：不僅要對接收的博物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也在1950年代，仿照蘇聯的模式建立地誌型博物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1993）。

立基於啓蒙理性形構下的西歐的公共博物館類型，基本上形成兩大分類：自然與文化(Bennett, 1995)；相較之下，社會主義中國的博物館，有其獨特的類型：革命歷史類博物館。在建政之前的共黨根據地，如瑞金、遵義、延安、西柏坡等，紛紛建立起革命歷史博物館。到1957年，紀念性博物館已達到23所（中國文化部文物局，1985）。受到蘇聯博物館陳列學的影響，中國的革命歷史型博物館實作上強調標榜著「革命陳列學」：

「運用陳列對群眾進行唯物史觀和革命精神的系統教育...陳列主要採用嚴密的編年體結構，即按照歷史發展的時間順序，將陳列內容劃分幾塊互相銜接的時期，每個時期再按時序排列，務求大是不漏，面面俱到。從革命歷史類陳列題綱看，從各部分（章）到單元（節）再到組（目），有的還往下列出重點（細目）等，基本上是歷史講義的框架。然後，再按各級主題要求選取革命聞問或製成輔助展品予以佐證、鋪陳，從而使陳列成為變向的革命史講義，成為

掛在牆上的教科書...要求整條主線不間斷、不跳躍、『一條紅線穿到底』。」(馬英民, 2005)

這樣的陳列與展示,確認了對於革命歷史敘事,是服膺共黨史觀、與黨的宣傳部門一致,而這種革命陳列學涉及的展示政治,正是前文中 Perry 談到的「文化操控」。即便在歷史博物館中,陳列展示的並非中共革命文物、而是不同時期的歷史傳承物,陳列展示的重點亦不在於個別文物的意涵,

「而是在它們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關係當中展示給參觀者...使其充分表現階級鬥爭、社會發展歷史的作用。...表現歷史是勞動人民創造的,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發展史...不以馬列主義的觀點方法進行研究,寫出陳列計畫,然後通過實物、文獻等表達出來,是不會有系統的、正確的陳列的。」(劉建美, 2007)

歷史文物陳列展示中,以黨／國家意識型態為主旋律,其中包括馬列毛主義、與國族主義(古明君, 2008)。這樣的博物館展示學,目標在系統地對群眾進行教育,許多博物館在展示的形式甚或內容上雷同,因為個別特色並非當時的博物館實作上的目標;形式與內容的雷同,也許反而可以避免政治風險。國家的敘事嵌入社會主義演進的敘事,展示之物則座落於其在此二重敘事交織的框架之中。因此,博物館成爲一個政治論述空間(political discursive space),對於歷史之物的詮釋框架,佔支配位置的是黨與國家意識型態。對於歷史傳承物既有的知識體系,像是掌握在知識分子手中的文獻學、金石學等,被壓抑於黨與國家意識型態之下。此外,雖然各種現代學科知識(如民族學、考古學、博物館學等)雖然也逐漸建制化並且運用在博物館的典藏研究中,但這些學科知識的實踐,也交織著社會主義文化治理(古明君, 2008)。

在分析在 18 世紀西歐民主政體下誕生的公共博物館展示的權力／知識關係時, Bennett (1995: 98)指出博物館是監獄等現代機構的一體兩面,但博物館的知識／權力展示,具有引導公眾行爲的技術性質,把集聚的人群轉化

改造為理想的與自我規範的公眾：

「[博物館]讓民眾認識到自身是被當做知識的主體而不是被管理的客體。...博物館修辭性地接納了彼此無區別的公民，併入了一套知識權力關係之中，...浮現成為資產階級民主社會的自我展現的重要工具。」(Bennett, 1995: 98)

相較之下，糾纏在社會主義國家肇造過程中形成的博物館的政治理性，並不是西歐公共博物館中的「自由的接納」，而是宣傳教育的一環。中共建立政權之前在解放區與蘇區進行的文化宣傳工作，在1950年代之後，由博物館等文化機構繼承：

「為了配合政治運動，各地還舉辦了許多規模不等的展覽活動，如《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展覽》、《中蘇友好圖片展》、《蘇南土改圖片實物展覽》等，所舉辦的一系列展覽中都配合了大量的說明員，對廣大觀眾進行生動的講解宣傳。講解工作成為了博物館進行宣傳教育的重要手段。根據統計，當時故宮博物院每天的參觀人數在五千人以上，逢星期天或節日，則觀眾多達一萬至四萬人次。上海博物館於1953年12月正式開館，1954年聽到講解的觀眾就有8萬2千餘人。」(葛云莉、趙翀，2005)

博物館組織設置上，就設有群眾工作部、常態化地進行宣傳講解(簡稱「宣講」)工作。

「1956年全國第一次博物館工作會議召開，[當時的國家文物局長鄭振鐸]對博物館宣傳工作...要求：要盡可能給學校的學生們、廣大的群眾們及專家們以參觀、參考的便利，並把介紹、解釋、宣傳工作作為經常性工作⁷。」(葛云莉、趙翀，2005)

⁷ 斜體為筆者標示。

不只是動員學生與群眾來參觀，宣講人員更是要走出博物館、以各種流動展覽、講座、教材製作與輔助教育等方式積極進行群眾教育。

因此，作為具有文化操控意涵的社會主義國家文化治理之一環，博物館立基的政治理性，並非現代國民的素質培育，而是在社會主義國家肇造中，透過文化進行對於社會的治理，以黨作為社會主義發展之先鋒，在黨領導下進行對於「群眾」的教育。

「群眾教育工作的任務是，以陳列展覽為主要陣地，通過講解說明及其他形式，向觀眾宣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想，傳播科學文化知識，以提高他們的政治思想覺悟和科學文化水平，激發他們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鬥爭的積極性。...博物館的群眾教育工作是黨的宣傳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博物館群眾工作者從一定意義上說，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造者。」（中國文化部文物局，1985：167-168）

因此，博物館解說就具有了治理技術的性質：透過它，黨與國家的意識型態得以接觸到人們的情感與靈魂，並且得以此將人群形塑為黨與國家所欲引領的「群眾」。如果引述 Foucault 對治理性的理解，博物館解說正因此「構成了「宰制技術權力(the technique of domination)與自我技術(the techniques of the self)的交會點」(Foucault, 1988b: 19)。

改革開放的中國、與變動中的博物館

根據《博物館事業改革開放 30 年》（中國國家文物局編，2008）⁸，標誌了改革開放時期的 1978 年中共 11 屆 3 中全會召開之後，國家文物部門於 1979 年召開全國省、市、自治區的博物館工作座談會，頒佈《省、市、自

⁸ 此書為國家文物局於 2008 年為慶祝改革開放 30 年、由文物局長領導課題小組進行的任務型出版，其中的資訊具有官方定調的意涵。

治區的博物館工作條例》。工作座談與條例都象徵著：在文革時期半停滯狀態的博物館工作重新開展。

「〔博物館〕業務活動與陳列展覽逐漸恢復。全國文物系統博物館1978年底只有349個，1982年增加到409個，...1990年增加到1013個，加上其他部門和行業舉辦的博物館，全國博物館達到1400多個。」（中國國家文物局編，2008：64-65）

然而，在此新時代中，博物館的變化中遠遠不只是數量上的變化。博物館工作不是恢復舊日光景，反而面對許多新的議題與挑戰：博物館管理體制的變化與私營博物館的出現、博物館的財務與營收運用、甚或者對於博物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的定位與功能等。這些議題與挑戰，呈現出博物館正處在計畫體制改革為市場轉向帶來的文化治理的變化。在上一節中，本文由陳列展示、與講解這兩項博物館實作，討論形構於社會主義國家肇造的中國博物館所涉及的文化治理。在這一節中，本文也將由這兩方面切入文化治理的變化。

中國的博物館工作者指出：中國博物館基本的陳列展示往往多年不變，不僅是由於佔支配位置的黨／國家意識型態框架，使得展示雷同涉及較小的政治風險，更是由於受限於計畫經濟體制下的文物國家所有制（馬英民，2005）。博物館皆為國家文化事業單位，有固定類別的預算編制，大規模的陳列展示變更（如新建館場）需要的經費，是特別編列而非博物館工作上的常態預算。因此，博物館這樣的文化機構，所處的制度性環境，是計畫經濟體制「〔經費〕主要由國家包起，〔工作〕由上級領導部門管起來，『一切行動聽指揮』，過著『等、靠、要』的日子」（馬英民，2005）。改革開放之後，商品化的力量影響了國家所有制下的文物體制（古明君，2008），各種以「改革」為名的嘗試，也使得博物館捲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變動中。以黨領導社會發展的治理性，在市場轉向的治理性變化下，浮現了不同於過往的治理目標，例如以表現與效益為判準來討論博物館的運作。過往，博物館只有「管理」問題，但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博物館也有「經營」問題

(如經營權可否外包? 門票收益如何運用?)。

操控在黨／國家意識型態框架下、運作於計畫經濟體制下的博物館，到了 1990 年代在「經營」問題上出現的諸種困境或矛盾，其中一種常見的解釋即是一陳不變的陳列展示缺乏吸引力(馬英民，2005)。在以造訪量為主要評量的市場經濟浪潮中，博物館的改革，首先就是改變陳列展示。在 1990 年代，陝西歷史博物館改建、並且大規模改變了其基本陳列展示方式。伴隨其後，許多國家級、或者省、市博物館相繼對其陳列展示進行整體的、大規模的變動。博物館不僅改變陳列內容與主題、並且往往建築新館場或增添技術設備。在上海博物館這一類新建的國家級博物館中，研究者評價其建築美學、藏品品質、燈光、陳列佈置，可以發現博物館以「無需言語的」形式和技術來呈現中華文明的宏大(Varutti, 2011)，而非滔滔絮絮的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宣傳。在上海博物館中，陳列展示的主題，不再以編年史，改採圍繞著特定藝術主題、以呈現物的美學性質。Varutti (2011)指出，相較於過去中國博物館陳列展示的主流方式所具有的政治論述取向，上海博物館的陳列展示更偏向於和諧、平衡等「傳統中國」美學原則，而非「共產主義美學」。

Varutti (2011)指出，自 1996 年上海美術館開館以來，中國許多的國家級博物館也受到其影響，呈現了一波博物館展示陳列的變化。他認為，這一波陳列展示美學的轉向(由共產主義美學轉向傳統中國美學)，有其立基的社會脈絡與文化政治氛圍—東歐共黨解體、中國 1989 天安門事件等事件，引發了共產主義在 1990 年代出現了意識型態危機。除了極左派之外，毛以及共產主義烏托邦語彙失去了正當性，亟欲需要凝聚國家共同體的道德資源。國內的氛圍如此，加上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強調向世界開放、與國際接軌，必須建立起國家集體的文化人格在國際世界中出場。因此，訴諸中華文明高點的文化國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逐漸冒興，並被策略性的運用以作為改革開放時期政權合法性的文化資源。「文化熱」正是這股文化國族主義下傳統美學的復興的現象，文化熱穿透到博物館場域，使得帶有社會主義現代性史觀的編年史綱領式的陳列展示，讓位給中華文化的藝術與美學主題

式的陳列展示。而這樣的轉變，一定程度上也展現了博物館中「國家敘事」的變化：從馬列毛的社會發展觀，轉向具有文化國族主義意涵的想像共同體。

我基本上同意 Varutti 的分析，但想從另一個角度探討這個現象：在文化國族主義逐漸上升，取代了馬列毛主義，成為主導博物館陳列展示原則的過程中，過往被掌握在知識分子手中、但在社會主義文化治理下受到壓抑的知識類型也逐漸復甦，但復甦之後是以一種現代專業知識（藝術、美學、遺產）的面貌、生存在博物館等文化機構中。當展品掙脫了歷史唯物關係與社會主義美學，以其自身所具有的價值而得以列位於博物館陳列之中，也就意味著，獨立於政治之外，存在著相對自主的價值體系。這同時也意味著，對於這些展品及其價值體系相關的知識，落在一個具有相對自主的專業範疇中。因此，陳列展示的美學轉向，於我來看，也就意味著，在博物館場域中，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的價值架構，逐漸擺脫政治意識型態的支配而取得相對自主性。我認為這和中國的博物館日漸增強的海外專業機構的聯繫有關。中國博物館學會於1982年成立，次年即以會員身分加入國際博物館協會。此外，某些具有聲望的博物館，甚至早在1970年代末即開始與國外的研究機構或博物館交流，到了1980年代，中國的博物館與海外機構簽訂合作協定、或者進行海外出展的數目更多。由於在海外展出時，展品解說採取了具有專業主義意涵的藝術分類（如亞洲藝術、東方藝術），使得展品脫離馬列毛意識型態、而落在美學凝視中(Varutti, 2011: 309)，它們是具有藝術與美學價值的精品、也是國之寶藏。這樣的展出呈現的藝術分類與美學價值，也反過頭來影響了中國國內認識展品的方式。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從文化治理的視角來看，美學凝視所預設的主體，當然不會是受到黨領導的人民與群眾，而是具有一定的美學素養的現代公民、或是受到「中華文化」薰陶涵養的「中華民族」想像共同體⁹成員。

⁹ 我在此以 Benedict Anderson 對國族主義的概念：想像共同體，來描述中華文化所具有文化國族主義意涵（吳叡人譯，2010）。

可以說有兩組不同的動能推動著自 1990 年代以來博物館出現的大規模展示陳列變革：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效益」與「表現」成爲評估博物館的新判準；二是博物館呈現了文化國族主義與專業主義共構的美學凝視。上述的討論較多的篇幅聚焦於第二部分，我接下來回來討論第一部分。除了美學凝視之外，在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博物館也出現了旅遊凝視與體驗經濟。由於開放初期景點與設施不足，中國政府指定數個國際知名的文化保護單位與博物館如秦兵馬俑博物館、故宮、敦煌莫高窟等，爲『開放單位』，接受外國遊客造訪。因此，改革開放初期主要的外賓旅遊造訪地點就包括了博物館（古明君，2012）。在各地發展旅遊經濟的過程中，某些博物館，或者由於具有國內外名聲、或者由於進行各種改革性的試驗：例如將制式的講解形式改爲更具有娛樂效果、或者體驗意涵的形式，這些博物館成爲旅遊吸引物(tourist attraction)、吸引的造訪者不僅數量增加，而且性質上不同於毛時期博物館的造訪者：比如外國遊客、以及逐漸增加各類國內遊客。

遊客增加了，那麼，要如何管理甚至引導這些多種多樣的遊客的行爲，不致於發生混亂，甚而達到博物館應該達成的目標呢？這成了博物館日常實作上的新問題。然而在，這個新時代，博物館的目標並非一統於黨與國家設定的群眾教育。面對著樣貌不確定且數量眾多的遊客，博物館日常經營的首要問題，即是認識遊客，分類遊客，引導規約不同的遊客之行爲：對中小學生施以愛國主義教育、科學或藝術教育，對海外華人宣揚中華文明的深遠，而有時對臺灣遊客還必須更爲強調文化親密性，對不同國家的外國觀光客可能必須強調的歷史、文化、器物...等美學專業；遊客還可能隨其經濟能力、文化教養、社會背景而應該有不同的引導與規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博物館，既是專業的文化機構、又是國家文化事業單位、還是旅遊造訪之處，這多重的原則交織於博物館的日常實作中。在這多重原則與複雜人群的交會下，博物館的文化治理不再只是黨交付的政治任務，而是博物館機構在每日運作中必須採行的技術性的手段與機制，以分類與掌握人群、規約引導其行爲，朝向特定的方向或達成某些目標。許多博物館是摸著石頭過河地發展出特定的技術性機制。相當弔詭地，在此過程中，原來服務於文化宣傳的解說

制度，逐漸轉變了其性質。

在計畫體制下，雖然博物館設置有解說員以進行文化宣傳，但在人事與資源配置困難的時刻，有時是由博物館研究員兼作解說，又或者在文革期間，博物館實行「講解、保管、衛生三員一體制」，也就是在最精簡的人力配置下維持著解說制度。直到1987年博物館工作的天津會議之後，三員一體制徹底廢除，解說員就負責解說（葛云莉、趙翀，2005）。同時，由於遊客造訪量的增加，遊客接待管理成爲專項工作，這也使得某些博物館將原有的「群眾工作部」更名爲「接待部」，此時，解說這種博物館技術，也開始有了變化：某些新建的博物館並沒有過多的解說，文物解說可以租賃的耳機型的個人導覽機，制式的解說讓位給觀眾以個人式自身體驗、美學凝視、觀光凝視爲主（Varutti, 2011: 307）。我在研究造訪某些博物館時，發現解說與旅遊表演和體驗活動相結合，根據訪談博物館的接待部，得知他們視此爲「改革」。「目的是使解說不要嚴肅枯燥、能寓教於樂」。而某些知名的遺址型博物館，爲了更好的保護遺址上的不可移動文物，將接待遊客的程序標準化，並且有特定的路線以達到造訪者的分流，導覽成爲具有人群引流、行爲管理、時間控制、空間控制、論述控制的機制。我訪談過的不同博物館，由於地理可及性、資源與名聲之間的差異，可能採取不同的模式來解說導覽：可能趨向專業化、或者偏向娛樂化。某些導覽中充斥著專業術語、強調美學體驗，也有導覽成了「說唱跳」式的旅遊體驗。不同的導覽方式，也預設了不同樣貌的造訪者：可能是有文化素養的個體化公民、可能是來此文化學習但行爲需要被規約引導的各種訪客、也可能是追求休閒、新奇、與體驗的觀光消費者。

然而，黨／國家意識型態已經完全退出博物館導覽解說了嗎？以下幾個例子的回答應該是否定的。首先，黨的宣傳部門仍然持續推動紅色旅遊與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建設；其次，汶川大地震這樣的重大災難之後，國家指定將地震受災地點原址原樣保留爲博物館，以宣揚黨在救災與災後建設上的力量；另外，2008年黨的宣傳部門提出：將全國各級文化文物部門及宣傳部

門管理的公共博物館、紀念館，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等，實行免費開放的政策，以「因應改革開放後對於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及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要求，因此要強化博物館的公益與社會服務性，以重新回應長期以來博物館做為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基地的社會功能」。（單霽翔，2009）我認為，過往馬列毛主義與國族主義，兩股意識型態力量相互交織主導文化治理，在市場轉向下的今日中國，馬列毛主義失去了霸權位置，然而國族主義冒興並取而代之成為佔支配位置的意識型態；與此同時，博物館的實作中，浮現了兩股逐漸掙脫了黨／國意識型態的力量：商品化力量、與專業主義。即便黨／國對於博物館所欲達到的目標未必全面性的佔有支配地位，然而在特定的時間點與空間點中出現，透過博物館這樣的治理技術，試圖形塑目標人群的情感與道德，引導其行爲。雖然此時這，博物館涉及的文化治理之目標人群，不再是社會主義下的「群眾」，而是具有消費者樣貌的市民、以及文化國族主義想像共同體中的成員。

結語

沿用 Bennett 從文化治理的概念來分析博物館涉及的治理、文化、與社會的關係，本文寫作時參照比較著他對於西歐及澳洲的公共博物館的分析，藉以凸顯不同於歐洲及澳洲的自由民主體制的治理脈絡下，當代中國博物館的誕生與轉變。其雛形初始於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期與西方交鋒下的中國現代化，但作為制度化的文化機構以及治理的技術的博物館，則是形構於社會主義國家肇造涉及的國家之想像、以及中國共產主義對於文化、對於黨和社會關係的理解等威權政治理性的交纏；而 1980 年代以來博物館面對的各種矛盾或挑戰，則是出現在改革開放時期由計畫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治理性變遷，以及中國向世界開放的集體心態的脈絡之中。

本文指出，在這樣的治理性變遷的歷史過程中，以下數種價值架構，在作為論述空間的中國博物館中交纏與起落：專業主義、國族主義、馬列毛思想。毛時期，佔支配位置的意識型態，是其中兩股價值架構交織而成：一是

系譜上取自蘇聯博物館學、延伸為中國的馬列毛思想，二是中國共產黨建國論述中的國族主義，二者相互交纏形成了中共在博物館工作上的重要依據。本文指出，自革命時期以來，文化宣傳工作一直是共黨重要的文化治理的工具，在革命期間運用各種文化資源進行社會動員，而全面取得政權之後，博物館繼承了這項功能，在國家所有制之下，由黨發動運用博物館作為文化治理的技術，以進行各項政治宣傳，博物館實作中的展示陳列與宣傳教育工作，在這樣的文化治理中，其目標是朝向教育和動員群眾、以及形塑人民的集體情感，以確定黨對於群眾與人民的領導。然而在改革開放時期，馬列毛思想逐漸成為破產的意識型態，失去其霸權位置，然而文化國族主義成為支撐中國共產黨統治正當性的價值架構、同時專業主義逐漸取得了相對的自主性。作為文化治理技術的博物館，今日中國博物館所結構的與形塑的主體，是具有消費者身分的公民、以及國族想像共同體之道德社群成員。由此，也可窺得一種不同於中共革命與建國過程中的政治理性於其中。

參考文獻

-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1993。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中國文化部文物局編，1985。中國博物館學概論。北京：文物出版社。
- 中國國家文物局編，2008。中國文物事業改革開放 30 年。北京：文物出版社。
- 古明君，2008。文物之用？：中國文物體制的形構與轉變，臺灣社會學，16：149-192。
- 古明君，2012。有問題的「遊客」？：旅遊、歷史博物館、與中國的文化治理。「遺產、旅遊與博物館：人類學的展望」國際專題研討會。福建省，廈門大學人文學院。
- 吳叡人譯，Anderson, B. 著，2010。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市：時報出版。
- 吳彥明，2011。治理「文化治理」：傅柯、班奈特與王志弘，臺灣社會研究季刊，82：171-204。
- 南通博物苑編，1985。南通博物苑文獻集。南通市：南通博物苑出版部。
- 馬英民，2005。論革命歷史類博物館現代展示理念與手法。中國博物館學會編，回顧與展望：中國博物館發展百年，頁：341-362。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 凌振榮，2005。南通博物苑的回顧與展望—紀念南通博物苑一百年暨中國博物館事業發展百年。中國博物館學會編，回顧與展望：中國博物館發展百年，頁：5-14。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 郭瑞坤，2010。現代觀看文化下的博物館展示，文化研究月報，110：3-24。
- 梁吉生，2005。中國博物館的驕傲—關於張謇及其博物苑的隨想。中國博物館學會編，回顧與展望：中國博物館發展百年，頁：15-21。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 單霽翔，2009。以改革創新推進博物館紀念館向社會免費開放。光明日報，2009年6月3日。
- 葛云莉、趙翀，2005。中國博物館講解工作百年回顧與展望。中國博物館學會編，回顧與展望：中國博物館發展百年，頁：135-141。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 詹挽強、王俞波，2008。淺談博物館免費開放的利弊及其應對。市場論壇，8：87-88。

- 趙明遠，2005。南通對中國博物館的貢獻。中國博物館學會編，回顧與展望：中國博物館發展百年，頁：36-45。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 劉建美，2007。新中國初期對蘇聯博物館經驗的學習和借鑑。中國文物報，2007年9月7日。
- 蘇東海，2005。南通博物苑誕生的歷史性貢獻。中國博物館學會編，回顧與展望：中國博物館發展百年，頁：1-4。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 Badica, S., 2011. Same exhibitions, different labels? Romanian national museums and the fall of communism. In: Knell, S. et al (Eds.), *National Museums: New Stud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pp. 272-289. New York: Routledge.
- Bennett, T., 1992a. Putting policy into cultural studies. In: Grossberg, L., Nelson, C. & Treichler, P. (Eds.), *Cultural Studies*, pp. 23-37. New York: Routledge.
- Bennett, T., 1992b. Useful culture. *Cultural Studies*, 6(3): 395-408.
- Bennett, T., 1995.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ennett, T., 1998. *Culture: a reformer's science*. London: Sage.
- Bennett, T., 2000. Acting on the social: art, culture, and government.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s*, 43(9): 1412-1428.
- Bennett, T., 2002. Archaeological autopsy: objectifying time and cultur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Cultural Research [Formerly Cultural Values]*, 6(1-2):29-48.
- Bennett, T., 2003. Culture and governmentality. In: Bratich, J. Z., Packer, J., and McCarthy, C. (Eds.), *Foucault, Cultural Studies, and Governmentality*, pp. 47-63.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ennett, T., 2004. *Pasts beyond Memory: Evolution, Museums, Coloni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 Bennett, T., 2005. Civic laboratories: museums, cultural objecthood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social. *Cultural Studies*, 19(5): 521-547.
- Bennett, T., 2007a. The work of culture. *Cultural Sociology*, 1(1): 31-47.
- Bennett, T., 2007b. Making culture, changing society: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21(4-5): 610-629.
- Dean, M., 1999. *Governmentality: Power and Rule in Modern Society*. London: Sage.

- Foucault, M., 1982. The subject and power. *Critical Inquiry*, 8(4): 777-795.
- Foucault, M., 1988a. Politics and reason. In: Kritzman, L. (Ed.), *Michel Foucault: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pp. 57-85. London: Routledge.
- Foucault, M., 1988b.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In: Martin, L. H., Gutman, H. & Hutton, P. H. (Eds.),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pp. 16-49.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Foucault, M., 1991. Governmentality. In: Burchell, G., Gordon, C. and Miller, P.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pp. 87-104.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 Foucault, M., 1993.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elf: two lectures at Dartmouth. *Political Theory*, 21(2): 198-227.
- Foucault, M., 2007.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Gordon, C., 1991. Governmental rationality: an introduction. In: G. Burchell, C. Gordon and P.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pp.1-51.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Lu, T. L-D., 2014. *Museums in China: Power, Politics and Ident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Perry, E., 2012.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Varutti, M., 2011. The aesthetics and narratives of national museums in China. In: Knell, S. et al (Eds.), *National Museums: New Stud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pp. 302-312. New York: Routledge.